



辛亥革命史料选辑



辛亥革命史料选辑

上册

丘权政 杜春和选

湖南人民出版社

辛亥革命史料选辑

上册

丘权政 杜春和选编

责任编辑：肖屏东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湘潭地区印刷厂印刷

*

1981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276,000 印张：13·5 印数：1—5,000

统一书号：11109·183 定价：1元

出版说明

本书是为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而编辑出版的。

辛亥革命是我国民主革命时期的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革命。这次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的统治，结束了支配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促成了民主精神在中国的空前高涨。虽然这次革命由于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最后失败了，但它从正反两方面，为五四运动的兴起，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准备了必不可少的条件；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开辟了前进的道路。

台湾省的史学工作者和历史研究机构，近年来先后发表了不少有关辛亥革命的历史资料。其中，很多是辛亥革命亲身参加者的回忆录或访问记录；也有一些是当时的原始资料。这些历史资料，对研究辛亥革命的历史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我们特予选编出版，供从事我国近代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者参考。

全书分上、下两册。史料的编排顺序是，上册：从兴中会成立到武昌起义。下册：各省光复。书中有少数几篇，如《兴中会各同志工作史略》、《新中国武装解决和平记》等，过去虽曾发表过，但因史料较为重要，目前查找又不容易，这次仍一并收入；有几篇史料中与辛亥革命史实无关的部分，作了某些删

节（凡删节的地方，都已加注说明）；有个别篇章对史实的叙述不甚准确，有的甚至违背事实，美化作者自己，或者字句脱误，词意不清等。为了保存史料原貌，一律未加改动，请读者在研究和引用时注意分析和辨别。

在编辑过程中，得到金冲及同志的指导和帮助，谨此致谢。

一九八一年一月

目 录

(上册)

我的老友孙逸仙先生	钟工宇	(1)
乙未广州革命始末记	邓慕韩	(9)
追怀孙中山先生座谈会		(20)
平山周谈商借菲律宾所购械弹事		(27)
兴中会革命史之一页	胡心泉	(32)
访问李纪堂先生笔录	陈春生	(38)
陈少白先生与香港《中国日报》及《中国日报》 与中国革命之关系	陈春生	(44)
兴中会各同志工作史略	黄大汉	(47)
美洲兴中会历史	廖平子	(77)
本党与洪门	邓慕韩	(82)
总理在欧洲最初倡导革命之情形	刘光谦	(85)
我之革命史	宾敏陔	(87)
访问邓家彦先生第一讲	居正修 记录	(89)

- 同盟会成立记 田 桐 (94)
中国同盟会成立初期（乙巳、丙午两年）之
会员名册 (98)
胡汉民自传 (156)
东京同盟会直隶支部之动作 张荩臣 (234)
同盟会云南分部之成立及其活动 张大义 (236)
平绍璜与贵州革命 朱寿颐 (250)
同盟会江西支部史略 蔡复灵 (254)
庚戌复兴同盟会本部纪略 张大义 (257)
中国同盟会文岛八港支会章程 (259)
记同盟会中之一个暗杀团 李熙斌 (266)
吴樾烈士传略 马鸿亮 (274)

丁未潮州黄冈三役别记 (279)
丁未防城起义记 陈春生 (289)
邝敬川、陈寿田所述钦、防、镇南关、河口
诸役起义详情 陈春生 (294)
熊烈士成基皖省起义记 张焕形 (302)
庚戌广东新军举义记
..... 徐维扬 编 邓慕韩 订 (306) ③

同盟会南方支部之干部及庚戌新军起义之回顾
..... 莫纪彭 (320)
广州三月二十九发难决定之经过 陈春生 (337)

三月二十九日之役与广州新军 马锦春(345)
孙总理三度游美事略 廖平子(362)

四川保路同志会与四川保路同志军之真象 曹叔实(367)
逊清湖北陆军第八镇革命回想录 吴绍奎(372)
前三十二标共进会秘密规约 (379)
湖北新军工程第八营革命经过并组织 熊秉坤(383)
躬与辛亥武昌首义及阳夏鏖兵之经过实录 甘绩熙(387)
起义前后的见、闻、经历（节录） 沈刚伯(421)

我的老友孙逸仙先生

钟工宇

在一八七九年六月初，那时我才十四岁，便从广州到达火奴鲁鲁 (Honolulu)。同年九月，我进入意奥兰尼学校 (Iolani School) 做一个寄读生。我入学时，华侨学童仅有唐雄和李弼二位。两周以后，孙帝象来了，他是以孙帝朱 (Sun Tai-chu) 的名字来入学的。其后，其他的中国学童也跟着进来。这一年里，我们已有十位侨生，七位寄读，三位走读。

“孙帝象”是国父早年所取的名字。直到他于一八九二年在香港得到医学学位时，才改称孙逸仙博士，此名后来名震全球。

国父是十四岁那年来到檀岛，这是由于他的长兄孙眉的主意。孙眉在火奴鲁鲁不远的依华 (Ewa) 地方辟一个农场，一八八〇年，他在火奴鲁鲁的京街 (King st) 至贺梯厘街 (Hotel st) 之间的怒安奴街 (Nuuanu Ave) 之左边，开了一爿商店。三年以后，孙眉迁至茂宜岛 (Maui) 姑哈禄埠 (Kahului)，在那里他又开了一爿商店。他继续供给国父在意奥兰尼学校攻读了四年，甚至将一部分产业转入他弟弟的名下。在那四年当中，国父渐渐对基督教发生了兴趣，他在基督教义中，

找到了更多的道理，而这些正是他早年信奉村神所不能满足的。孙眉知道了他的幼弟已为外教所惑，且将舍弃祖先的信仰，他便采取了在那时候处于他的地位任何人都要做的措施：他写了一封信禀告他的父亲，并令国父乘船返回故乡。国父于是不得不走了。那是一八八三年的事。到了一八八五年初，孙眉寄了一笔钱回家，要国父重返檀岛。国父很高兴的回来了。当他一到火奴鲁鲁后，便马上去姑哈禄埠谒见长兄。这时他才明白回来的真相。原来孙眉要他返檀，并不是让他再回到学校去念书，而是要将那些用他的名义所置的产业收回。国父答应了他哥哥的要求，可是孙眉却完全反脸，不只拒绝给国父任何帮助，甚至不送他再回中国。国父失望之余，跑到火奴鲁鲁来找我。我很高兴能够和国父重遇，于是他住在我那里有好几个礼拜。

我们什么时候变成了好朋友呢？那是在一八八〇年，当我们同是意奥兰尼学校的学生时，我们即成莫逆。回忆早在一八八〇年，我第一次在檀岛过农历新年，只有我是一个有家归不得的中国孩子，因此只好在学校孤单的度过假日，做着我经常做的杂务。我在此应该加以解释的，这是我们学校的政策，规定寄读生每天做一些轻便的工作。意奥兰尼学校是英国圣公会史泰利主教（Bishop Staley）创办的，与圣阿鲁宾学院（St. Allan's College）相类，用来教育夏威夷及混种夏威夷青年的。后来该校才招收那些来自东方的华侨学童。一八七二年，韦礼士主教（Bishop Willis）接替了史泰利主教，当我们在一八七九年入学时，意奥兰尼学校正由他主持。他指派我管理输水到浴室的抽水机，这是一年三百六十天不断的工作。唐雄担任铲

除芋塘的杂草。其余的则照料校园中的蔬菜。在农历新年中，其他九个华侨学生都有家可归，而我因双亲远在夏威夷大岛的加禄亚埠 (Kailua)，即使在农历新年的时候，亦只得留在学校做着我每日的勤务，这是一个对我多么无聊的假期啊！不久之后，国父和我逐渐成为知交了，所以到了第二个农历新年，我被国父邀到他的大哥商店中同度新春。阿眉照样客气而和蔼的邀请了其他在本市无家的孩子同享快乐。这时我们多么兴奋啊！在那种日子里，中国新年是“恭喜发财”的佳日，每个人可随便拜访，特别是那些大块头的夏威夷警察和商店的老主顾们。他们进来随意吃喝，并且还拿走红封包的利市钱。就是那些白种的商人，也在这年节来拜访他们中国的同业。

一八八一年的夏天，我父亲因为我读不出一封字迹潦草的英文信，便认定我的求学浪费了他的金钱，而开始要我从事他的事业，克绍箕裘。我便为父亲强迫留在夏威夷大岛的加禄亚埠。经过两年快乐而漫长的光阴，父亲才允许我再回到火奴鲁鲁继续在意奥兰尼学校攻读。国父此时已被送回国了。当学校开学之前，唐雄的父亲发现了我和他的儿子去参加“主日学”，我父亲知道非常生气，要我剃光头去做和尚，以为我贻羞了双亲，又贻羞了祖先的信仰。他叫我放弃读书的念头，去学裁缝。一八八五年，国父却来找我了，此时，孙眉事实上对国父置之不顾，而我正经营着一间裁缝店，这就是为什么我能在国父困难中招待他的原因。

芙兰谛文 (Frank Damon) 牧师是一位在中国广州服务多年的教士，他娶了一位生长在广州的女传教士，她会说一口

道地的广东话。谛文夫妇在一八八五年已开办一间寻真书院 (Mill's School) , 位于怒安奴街与教堂巷的拐弯处。他对国父极其赏识，鼓励他不要忽略了他的学业和宗教的信仰。这时国父已决心学医，打算回广州求学，可是他没有旅费回去。谛文牧师自告奋勇在他的朋友中进行筹款，居然一举成功。我知道有一位在Castle and Cooke公司做事的柏文先生 (Bowen) 捐了五元，我也捐了五元，当时等于我做裁缝一个月的薪资。同时，我告诉国父，他可以在我的店中随意选用他所需要的衣物，于是国父选了几样他需要的东西。国父乘搭一艘海洋船公司的客船回去，这船公司在檀岛的代理商是赫格飞公司 (Hackfeld's) ，因为轮船吃水量太深，只能停泊距港口三浬以外，赫格飞公司备有平底船专门接送旅客登轮。国父离檀之晨，我亲送他登船，然后珍重道别。等到我重回岸上时，已经差不多延至下午二时了。

国父没有违背他的初衷，在一八八六年，他回到广州从嘉约翰博士 (Dr. John G. Kerr) 去学医。嘉约翰博士教授过许多中国医科学生，桃李峥嵘，其中两位到了檀香山而成名的，就是李启辉夫妇。

但国父并没有在嘉约翰博士那里完成其医学，因为在广州一年之后，他转到香港的西医书院 (Alice Memorial Hospital) 去，在一八九二年得到医学学位，从此他改用了孙逸仙博士之名。

我和国父首次重聚，是在他离檀四年之后，在一八八九年，我去香港结婚。我一到香港，立即到西医书院去拜访国父。我

记得他穿着一件白色长袍。他见到我非常高兴。当时他很忙，我们约好晚间会晤。那真是一个美丽之夜。国父为了陪我，也改穿了西服。我们沿着香港码头徘徊散步。虽然戒严的笛声在九时响了，但并未将我们赶出码头，就是那印度红头阿三也没有来干涉我们。此夜良晤，使我永不忘怀。

后来，国父为号召革命运动，反抗满清，便经常往来于东亚与美洲之间，且常常逗留檀岛和我们这一班赞同革命尽力之所能的朋友相晤。我私下再三告诉他，如果需要革命的款项，用不着迟疑来找象我这样的友好帮忙，但我从未听见他向檀岛任何友人进行筹款。有一次国父由日本携来一批丝绸，约值美金伍百元，他要我代他沽去，我亲自将这些货物分销给他的友人和相识的人们，并于短期内收齐货款送给他。国父对我脱售货物之迅速表示惊奇和谢意，他并告诉我曾经托过其他的友人代销货物，然而有些所谓朋友也者，不是拿了他的货，便是要了他的钱，我是那些少数清还他的货款的一位。他又告诉我，这些出售货物所得的款，是用来供给那些革命同志，并用以推动革命组织和活动的。

国父在他旅行期间，心里便有一种组织秘密团体的念头，以便在海外华侨中间散播革命主义。到一八九四年底某次定期访问檀岛时，他创立了兴中会，即现在众所周知的中国国民党早年之雏型。在何宽私邸参加第一次会议的那些最早的会员中，我大约是硕果仅存的一位。现在仍活着的其他同志，只是参加过兴中会后来的集会，尤其是一九〇三年兴中会重新改组之后的会议。当时，国父回檀探视他在茂宜岛的家属，逗留六个月的时间，国

父曾对他的政治信徒予以鼓励。这段时日，也正是我们集合了一群青年来接受军事训练，以便有一天我们确能参加领导中国的革命运动。可是我们对军事训练的兴趣，维持并不很久，便告解体了。

一九一一年初，国父最后一次访问檀岛。在这最后一次访问期间，他因为革命运动进行迟缓，极感失望。他告诉我，他不知道谁可信任，因为许多人背叛了他，不是将情报偷偷的送给满清政府，就是携取了革命款项而开小差。他精神颓丧，并认真的计划着放弃他对唤起民众之努力而再去习医。他相信用四个月的工夫努力研究，必能对医学有所造诣，而能再度合格去行医。我以古谚“努力，努力，再努力”来提醒他，并且对他说，只要老朋友中象我这样的，深信着他和他的革命运动能够成功，他不应沮丧，必须继续努力下去。国父由檀香山赴三藩市后，向东而行，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途次典华城，忽接获黎元洪在武昌起义的消息，于是取道英伦返国，组织中华民国政府。

在那短短的两年里，国父才晓得满清政府之推翻，只是导致种种其他潜势力的序幕，而这些潜势力之所致力的政府形式和推行的政策，与国父创立的党和它忠实党员的民主思想，大相径庭。在这种精神的斗争和折磨之下，国父渐渐为那极端弄权的专横的袁世凯和他的爪牙所厄，被迫放弃政权，而改任全国铁道督办。一九一三年，我和内子乘船到日本和中国，试看那大部尚未开发的中国地区有无安居乐业的可能。当日本天洋丸于三月二十三日泊于长崎时，我听说国父已来长崎了，便马上去拜访他。我在他下榻的日本饭店门前遇到他。他刚好被三

菱洋行邀请前往参观该行长崎造船厂，正欲离寓。他邀我参加他的团体行动，并让我的朋友陪同我的内人继续去游览。

我不久发现国父参观三菱造船厂是一件很隆重的事。我们被引导参观工厂，走马看花的看了一遍，甚至看到正在制造中的三艘巡洋舰。我们在未与主人进午餐之前，曾摄影留念。此照我现在仍然保存着。午饭后，我们的主人给我们看一只完整的小型炮艇模型，并建议为我政府制造。这样的一艘炮艇在那时候需要十万日元。这次参观，给我一个启示，就是日本在工业发展方面有迅速的进步，此行令我非常高兴。

下午我们回到国父下榻的旅邸，国父当时知道了我对东北安家很感兴趣，然而他告诉我，东北气候太冷了，对我们不适宜。他解释说，那些去东北拓荒的山东农民，都是在早春时去播种，到了晚秋收成之后，又依旧返回他们的山东老家。这样他们便可以避过东北的寒冬。我告诉国父说，我之所以想到东北，是因为我听说那里的地价廉而易于置业。于是他想介绍我去见东北的高级官员，但我对于前往东北是否有益，既发生了怀疑，所以没有接受他的建议。

那天下午同时带给了国父一个很伤心的消息，就是宋教仁被刺了。宋教仁是国父最信任的左右手之一，谋杀的地点是发生在上海火车站。国父决定缩短他的考察日本铁路和工业的时间，当晚乘日本天洋丸返沪。轮船公司对国父优礼有加，供给最好的设备和一个专用的二等餐厅。我和内人也荣幸的与国父同桌共餐。三月二十五日抵沪，我的表兄钟文耀在码头接我们。从他那里我才得悉这次暗杀案的内情。当同盟会解散以后，宋教仁是国民党的主要人物。袁世凯排斥国父自居总统后，宋

教仁对其倒行逆施攻击甚烈，所以这次的暗杀，本党报纸一致抨击，指出此案是由袁氏主使。国父抵上海时，才知道本党同志决定倒袁。我的表兄那时任京沪铁路局局长，他在郊外一间高贵的俱乐部设晚宴为国父洗尘，可是国父与唐绍仪——国父派与北京政府联络之代表，因为举行某些重要的政治会议，都不能参加。在我邻座的一位在上海颇有名气的广东商人，知道我与国父的交情之后，他便向我埋怨国父失信。因为在一九一二年，革命甫告成功，国父派胡汉民在上海向他的广东富商友人中借款，允付给高利清还。这笔借款当时南京政府需要至急。那位富商告诉我，此款不但没有利息，也没有还本。他并说，国父和他部下这帮人如此的没有信用，将使国父很难得到他在上海的朋友的援助。翌日，当我将这些怨言转告国父时，他很惊奇此事尚未处理。他告诉我，袁世凯曾答应归还所有的革命债款，而上海的这笔借款是指定在清还债款之内的。国父更提到那时是处于困境，他被任为全国铁路督办，只拿到一个月的薪金，同时在工作推进中，深感经费困难。

宋教仁被刺案发生以后，国父与袁氏之间破裂愈深。其后袁氏竟宣布帝制，露出了他的本来面目，可是洪宪帝制仅昙花一现，迨云南起义，革命的火焰烧遍了整个西南，这个悲哀而自称为皇帝的袁世凯，一看见墙上革命的标语，便一命呜呼了！

国父的革命事业，屡经波折，后来，国父在南方开府了。某一次，国父在广州由英炮艇护送脱险，此役不久告平。其后，国父应北方新军事领袖之请，北上商讨国是，国父遂于一九二四年除夕抵达北平。在会议之前，国父疾发，即入协和医院就医，延至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溘然长逝。

乙未广州革命始末记

邓慕韩

导　　言

乙未广州之革命，不独为孙中山先生实行革命之开始，实为有清光宣以来颠覆满洲政府之先河。事虽未成，然以是时人才缺乏，民智未开，竟能有此掀天揭地之举，且预备方略，布置完密，后来诸役仿照而行，有不能不佩服孙先生当日之苦心经营惨淡也，故详纪之。

起　　源

吾粤於宋有崖门山之痛史，於明有流花桥之遗冢，近有洪杨崛起，其所闻所见皆足以使粤人惊心动魄，而起种族兴亡之感。且有以反清复明相号召之三合会，二百余年潜伏各地，一触即发。时有香山（现改名中山县）翠亨孙文，原名德明，号逸仙，其后居留日本时易名中山樵，故人以中山先生称之，诞生时距太平天国灭亡未远，其遗老义士，往事传谈，增人感触。适有甲申（清光绪十年，西历一八八五年）安南之役，战争结